

壮烈的开端

南昌起义研究

徐兆麟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壮烈的开端

南昌起义研究

徐兆麟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 / 徐兆麟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210-04617-2

I. ①壮… II. ①徐… III. ①南昌起义(1927)—研究

IV. ①K263.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3100 号

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

作者：徐兆麟

责任编辑：曾杨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6898137

发行部电话：0791-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页：2

印张：1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210-04617-2

定价：32.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版权登字-01-2010-9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再版序言



南昌，一座始建于汉代的历史古城。位于鄱阳湖畔、赣江之滨。83年前，在这里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八一起义。世界为之震惊，中国历史为之改写。从此，“八一”，这两个原本再普通不过的汉字，成为人民军队的标志。八一精神，成为我们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向着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奋进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之一。

研究八一精神，自然不能不从全面正确地认识南昌八一起义入手。徐兆林（即徐兆麟）所著《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以下简称《开端》）一书，是一本对南昌起义有着较为深入研究的好书，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南昌八一起义很有帮助。

尊重历史，是该书坚持的重要原则。该书对南昌起义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从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到起义的酝酿、决策、周密准备和胜利实施；从撤出南昌后的南征广东，到汤坑失利、潮汕失守、三河撤退、流沙溃散；从主力失利后起义军余部的艰难转战、到赣南“三整”、湘南起义，直至奔向井冈山、朱毛会师、共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的壮烈画卷。作者在书中对整个事件的叙述，都以有关的历史文献、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及参加者的回忆文章为依据，广泛地吸取了史学界专家学者关于南昌起

义的研究成果,为准确地真实地反映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的面貌,作了不懈的努力,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感到,作为研究南昌起义历史的书籍,该书的内容真实、可信。

史论结合,是该书运用的重要研究方法。与一般研究历史课题的书籍有所不同,它既是研究南昌起义历史的书籍,又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历史。把我党我军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南昌起义的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研究,站在理论的高度,以理论为指导,对起义的全过程及其重要环节、起义活动及与其相关的历史环境、起义军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对建军理论的宝贵探索、作战指导上的成败得失等等,都进行了精辟的理论剖析。全书没有烦琐的史实考证,避免了就事论事的单纯历史事件叙述。取而代之的是对南昌起义的深刻的理性思考。读者从中读到的远不止南昌起义这一段历史,而且能从中领略到,中国共产党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初期,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异常艰辛、非凡勇气和卓越智慧。

不囿于已有的定论,勇于创新,是该书突出的理论成就。南昌起义,是史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同样的课题,同样的史实,研究出来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过去南昌起义研究中,一般认为,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起义本身是失败了。该书运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剖析了这一历史事件,认为,南昌起义不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创建了一支虽然数量不多,却是信念坚定、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对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战争理论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开创性贡献,从而使南昌起义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逻辑严谨,文笔生动,是该书的鲜明特色。

鉴于以上理由,我们隆重推出《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希望对有志于南昌起义研究的朋友有所帮助。

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

2010年9月1日

前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经历了 22 个春秋,气势波澜壮阔,战绩震惊世界;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火中诞生,在硝烟中成长,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成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的解放者和保卫者。人民革命战争的不断发展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是既有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过程。任何过程都必定有自己的起点,上述两个过程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两个过程的起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发生在 1927 年 8 月 1 日的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在反革命势力十分强大的时候发生的。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处在稳定的时期,暂时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没有严重的分裂和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帝国主义不仅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而且数个帝国主义结成了干涉破坏中国革命的反动同盟;曾一度与共产党联合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党中的反动派,背叛革命,投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怀抱。国际国内各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南昌起义又是在革命力量十分弱小的时候发生的。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又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革命指导的严重错误,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摧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由高潮跌至低潮。

壮烈的开端

南昌起义就是在这种对革命发展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它的发生,表明了共产党人不怕挫折,不畏强敌,向着自己的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坚强意志。在这种条件下爆发的革命武装起义,势必遭到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疯狂镇压。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双方斗争的激烈性、残酷性。再加上我们党刚走上创建军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经验不足,需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建军中学习建军,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斗争更加艰难曲折。

正因为如此,南昌起义这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战史的开端,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极其壮烈的一幕。

作者

1992年5月30日

目录



再版序言	1
前言	3
第一章 姗姗来迟的转变	1
第一节 合作是国共双方的需要	1
第二节 胜利之中酝酿着失败	9
第三节 屡屡错过时机	12
第四节 步步退让结下的苦果	18
第五节 转变并非突然萌发的念头	23
第二章 顺应历史潮流的果断决策	31
第一节 共产党人的血不能白流	31
第二节 再也不能贻误的时机	33
第三节 集体的智慧和勇气	38
第四节 南昌注定要成为英雄城	43

第三章 划时代的枪声	47
第一节 起义部队挺进南昌	47
第二节 代号“炮兵营”	51
第三节 箭在弦上时的争论	57
第四节 特殊的条件,特殊的方式	60
第五节 觥筹交错的“特殊战斗”	68
第六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漂亮的 歼灭战	70
第七节 “喜庆工农始有兵”	77
第八节 并非单纯的军事行动	81
第四章 英勇的远征	86
第一节 敌情严峻而又微妙	86
第二节 进军何方?	91
第三节 出师不利	93
第四节 杀开血路	98
第五节 迂回前进	110
第五章 悲壮的决战	116
第一节 形势险恶	116
第二节 指导失当	118
第三节 汤坑失利	122
第四节 潮汕失守	126
第五节 三河撤退	129
第六节 流沙溃散	133
第六章 开始艰难的再探索	138
第一节 摆脱敌人的重兵追击	138
第二节 “做失败时的英雄”	141

第三节	政治建军提到了议事日程	145
第四节	开始实行军事战略转变	147
第五节	巧妙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149
第七章	走向农村的一次伟大实践	158
第一节	智取宜章进军农村首战告捷	158
第二节	巧战坪石游击战初露锋芒	163
第三节	土地革命把湘南暴动推向高潮	166
第四节	主动转移失地存人功不可没	174
第八章	踏上光辉的大道	178
第一节	历史性的握手	178
第二节	会合后的激流	188
第三节	找到了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	194
附录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军事战略转变浅探 ——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六十周年	198
	南昌起义军对地理条件的运用及其得失	204
	南昌起义历史地位新论	211
附录二：		
	评《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	226
	主要参考书目	228
	后记	231
附图：		
	1.南昌起义及进军东江作战经过要图	
	2.井冈山会师示意图	

第一章

姗姗来迟的转变



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这一革命高潮，又促成了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的胜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大批共产党人的惨遭杀害，革命势力的极度削弱，反革命势力的空前嚣张。这是一种多么不合逻辑的发展变化！然而，历史却就是如此这般血淋淋地写着。当时，中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北洋军阀。杀害共产党人的枪弹，不是敌人从对面射来的，而是“盟友”从背后射来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难怪革命失败得那样惨烈。以鲜血为代价的学费无疑是最昂贵的学费，花这样的代价学来的知识自然是最宝贵的知识。共产党人终于懂得了自己要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有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装。这在现在看来已是普通常识的问题，在当年却是来之不易的重大转变，尽管它姗姗来迟。

第一节 合作是国共双方的需要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必然产物。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也为了实现各自的奋斗目标，国民党需要共产党的帮助，共产



党也需要寻找同盟者。

孙中山先后组织和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等组织，或是官僚、政客的集合体，或是资产阶级的松散同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在这些党派组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致使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屡遭失败。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此后，为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多次组织和举行武装起义，都一一失败。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总算把清王朝推翻了。但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采取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面手法，肆无忌惮地篡夺革命果实。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当时认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就是革命成功。因此，同盟会内部迅速发生分裂和涣散。孙中山内外交困，被迫妥协，让位于袁世凯，致使辛亥革命功败垂成。从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取代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统治者的招牌换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却依然如故。

于是，后来有了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同样由于国民党内部分认识不一，组织涣散，发动不到两个月便失败了。

1917年至1918年间，孙中山借用军阀的势力，发动了反对北洋军阀、维护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但各派系军阀在战争中并不图“护法”，而是争夺私利，一旦私利有所满足，便各行其是。护法战争因此以失败告终。

使孙中山失败得最惨的，要数陈炯明的叛变。

陈炯明于1909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海外。1915年护法运动中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袁世凯死后，陈炯明表示拥护孙中山。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期间，把陈炯明的粤军作为主要依靠，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持，对陈炯明委以重任。当时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几乎全部集中于粤军。随着权力的增加，陈炯明的野心迅速膨胀。他拥兵自重，反对孙中山进行北伐、统一全国的主张，鼓吹“联省自制”、“保境息民”，企图独霸广东。孙中山多次派人劝说陈炯明改变立场，陈炯明毫无悔改之意。甚至借故刁难，制造障碍，暗中勾结吴佩孚，阴谋南北夹击孙中山的北伐军。孙中山被迫下令解除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和内政部长职务，只保留其陆军部长职务。陈炯明便立即决定公开与孙中山对抗。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支持下,公然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虽然孙中山及时转移得以脱险,但他惨淡经营的粤军几乎瓦解,广州革命根据地也随之丧失。

孙中山对这次失败痛心疾首,他在《致国民党同志书》中写道:“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俚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这次失败使孙中山完全陷于绝望之中。

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危难中的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促使他深刻总结了革命数十年特别是辛亥革命十多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他痛切地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②深深感到依靠原有的力量,按照过去的老一套办法,绝对不可能完成革命事业。

于是,他决心改弦更张,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是孙中山全部革命生涯中最有意义的转变。这一伟大的转变既是他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也是他领导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起死回生的迫切要求。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国共合作,对于国民党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共产党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远远不够强大,初创时期的共产党力量还很弱小,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联合其他革命阶级和政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同反帝反封建,是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革命事业所应采取的正确策略。

首先提出国共合作问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共产国际。当时,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既没有认识到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又因为国民党是堕落腐化、争权夺利的集团,而不愿与其合作,甚至连后来推行投降主义的陈独秀,起初也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中国、朝鲜、蒙古、日本等国的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中,有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还有以各种不同身份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员王尽美、邓培、邓恩铭、林育南、高君宇、于树德、罗亦农、张太雷、瞿秋白、俞秀松等人。

在大会上,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做了题为《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报告依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远东各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

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等重要问题。报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和援助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同时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并且要求无产阶级把农民吸引到民族民主革命中来。

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列宁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表达了他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希望。

1922年4月，张国焘、瞿秋白等人回国。他们向中共中央和各地党员汇报了大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明确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提高关于建立国内联合战线的必要性的认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共产国际还通过其驻中国的代表，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双方做了大量促成联合战线的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之下，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政策，从而迎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会址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今广州市延安路鲁迅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出席了大会。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还参加了大会宣言、组织章程、组织宣传、组织党务等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委托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起草的。以此为标志，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1905年11月提出的同盟会政治纲领，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对其先前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的概括。它在当时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许多致命的弱点，如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皇帝，而未把地主阶级作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来反对，等等。旧三民主义的这些弱点，正是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之前屡屡失败的理论根源。国民党一大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比旧三民主义有很大的发展，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

因此,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历史功绩,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赞扬:“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③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后,大大推动了中国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民主革命运动。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后的有利形势,积极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广泛开展工农运动和军事工作。

自1923年“二七”惨案以后转入低潮的工人运动开始恢复和发展,各地工人罢工斗争日趋活跃,并不断取得胜利。1924年五六月间湖南湘潭铅矿工人、江西九江码头工人、上海丝厂女工先后罢工。七月,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斗争坚持了1个多月,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共产党建议,通过了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决定。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产党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为全国20个省区培训了近800名农运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北伐战争开始后,工农运动更加迅猛发展。1927年初,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人加入工会者达280万人,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工人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武装纠察队。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全国性的工人斗争尤其是南方各省的工人斗争形势越来越好。1月1日至3日,武汉人民群众集会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英国水兵以武力驱逐在英租界附近集合的群众,当场用刺刀刺死1人,伤数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5日,武汉人民在刘少奇、李立三的带领下,举行30万人的大示威,愤怒的群众冲入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接管了租界。1月6日,九江工人为反击英国水兵枪伤码头罢工工人,奋起占领了英租界,并迫使英帝国主义于2月29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议,正式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3月,周恩来等领导和指挥上海80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在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出现新的高潮。广东、湖南、湖北、

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发展得尤为迅猛。广东作为北伐战争的革命根据地,农民运动开展得早,发展得快,早在1925年5月1日,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省农民协会时,会员就达21万多人。湖南省在北伐前拥有农会会员40万人,受共产党直接影响的群众约100万人;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会员激增至130万人;1927年初,又猛增到200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人以上。湖北省农会会员,1926年7月末为7.2万人,12月底达28.7万人,翌年2月增至80万人。江西省农会会员,1927年2月发展到30多万人。

1927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已达972万人。农民协会组织迅猛发展,组织起来的农民向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农民运动特别发达的地区,农民把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

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的队伍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共合作前,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党只有420名党员,到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前夕的1927年3月,党员已发展到57967人,比国共合作前增加了137倍。党的组织遍及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党在全国的影响迅速扩大。并且,党还领导和影响着国民革命军3万人,在军队中有共产党员约1500人。

国民党通过国共合作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改组前的国民党原是一个组织松散、成分复杂的团体,军阀、政客充斥其中,组织力和战斗力很弱,孙中山领导这样一个党,历经磨难,落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健全了组织,创办了军校,发展了军队,得到了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于是有了北伐战争的辉煌胜利。

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消灭封建割据,是广东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

北洋军阀是袁世凯建立的封建买办军事政治集团。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末通称辽宁、河北、山东等北方沿海各省为北洋),实际上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外交大权。他把新建陆军扩充改名为北洋常备军,习惯称北洋军。从此,袁世凯一派北洋军阀的势力就逐步形成发展起来。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几个派系。他们都是以某一两个帝国主义为靠山,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互相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混战,争权夺利,抢占地盘。在长期的混战中,他们的势力经常分化组合,消

长不定。至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战争前夕,北洋军阀主要有三大派系: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 20 万,拥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陕西的东部、河北的一部,控制着京汉铁路;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拥兵 20 万,据有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 35 万,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及津浦路北段。此外,还有一些小军阀,控制着本省或本地区。

国共合作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高涨,人民群众对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残酷压迫、剥削和镇压工农群众的罪行愤怒到了极点,用革命战争推翻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6 年 7 月 1 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 8 个军的大部分陆续出发,兵分三路:一路入湖南、湖北,这是主攻方向;一路取江西;一路进福建。

在两湖战场上,北伐军投入了第 4 军、第 7 军、第 8 军共 3 个军的兵力,约 5 万人。这一路以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独立团于 5 月 1 日从广东肇庆先行出发,6 月 2 日攻占湖南攸县,后与大军一起,7 月 10 日占领醴陵,7 月 12 日攻克长沙和浏阳,8 月 19 日占领平江,8 月 22 日占领岳阳,然后进入湖北,与吴佩孚主力决战。

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刘玉春师固守汀泗桥,北伐军第 4 军共 6 个团,攻打一天一夜,进展不大。这时叶挺独立团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深夜从右侧秘密迂回到敌后,于 8 月 27 日拂晓一举攻占了敌鼓角塘阵地,守敌仓皇溃逃,独立团乘胜迅速挺进,占领咸宁。

节节败退的吴佩孚被迫在贺胜桥防御。8 月 28 日,第 4 军、第 7 军攻击贺胜桥。第 7 军遭受敌人反冲击受挫后,敌乃以优势兵力向独立团猛扑。独立团英勇奋战,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反冲击,而且楔入敌防御纵深,攻占了直系统帅吴佩孚的指挥所,于 30 日占领贺胜桥,并向武昌追击。

此时蒋介石见武汉三镇指日可下,急令其嫡系第 1 军第 2 师由长沙进抵武昌,欲抢头功。该师师长刘峙谎报他的部队在 9 月 6 日鸡叫前已入城。第 4 军代军长陈可钰立即打电话向叶挺通报,并令其率部迅速入城。但是,当叶部走到大东门时,守在城上的还是敌人。这时叶挺接到独立团第 1 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牺牲前的报告:其他师的奋勇队都没有靠近城墙,只有第 1 营到了城根,并竖起了四座云梯,爬上去的战士大都英勇牺牲了。叶挺义愤填膺,立即向